

“无情”也是真豪杰

——蒲公才戎马生涯中的儿女情长

本报记者 李科洲 李关平 通讯员 谢振安

但凡成大事者，总会有大遗憾。革命战争年代，蒲公才参加过大小战役，战功显著，但也留下了时时噬咬他心灵的大遗憾，5位亲人相继病逝或献身革命，他竟多年后才获知。而与老母亲一别十多年，竟成天人永隔，尤令他伤感不已。

蒲公才1908年出生于儋州市峨蔓镇下浦村，原名蒲广言，因为两只手都长着6个指头，别称“蒲十二指”。乡人认为，这是蒲公才异于常人的征兆，必有一番大作为。多年后，他终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然戎马生涯，有家难回。直到1976年，他才“衣锦还乡”，回到下浦村。此时，距他离家已经过了38年。

来到下浦村，走进“蒲公才将军故居”，在蒲公才的堂侄、儋州市人民法院退休干部蒲开恒的讲述下，我们试图走进那段艰辛的岁月，去体味一位革命者的感人情怀。

别，别时容易见时难

就要到延安去了，要不要告诉母亲？1938年五六月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蒲公才。

那一年，蒲公才作为全岛3名骨干党员干部之一，被琼崖特委选派去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这是多少党员梦寐以求的机会，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但一想到母亲，沉浸在幻想、期待中的蒲公才便被拉回现实，陷入彷徨。

为了这个家，母亲吃了很多很多苦。

蒲公才未满3岁时，父亲病逝，是母亲用她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一切。家里上有年迈的祖母，下有广爱、公才、广功三兄弟和姐姐。面对沉重的家庭负担，面对来自社会的歧视与欺凌，母亲强忍悲痛，挺起腰杆，除下地操劳外，她还自酿米酒，挑到集市上出售，苦苦支撑起这个六口之家。

蒲公才小时，祖母和母亲常眼含泪水训导他，要“正经做人”，要“勤劳为本”。6岁时，蒲公才已经懂得体恤母亲的艰苦，开始跟着母亲下地干活了。上学后，每天一放学，他就去放牛、拾柴。蒲公才学习成绩优秀，受到母亲的特别疼爱。

除了母亲，兄长蒲广爱是最受蒲公才敬重的人了。公才十几岁时，广爱与合伙人合伙从事海上运输业后，家庭经济状况有所缓解。公才后来能到广东省第六师范学校、北平中国大学附属高中部读书，都有赖兄长的无私供给。

兄长虽不是共产党员，却为党的事业全力奔走。他的货船常年行走海口、琼山、三亚、乐东、东方一带，在拉货的同时，担负起了与海边的共产党联络点联络的任务，被称为“共产党船”。

蒲公才明白，他到延安学习是党的机密，家里人谁都不能告知。临行前，他编个借口只对哥哥广爱说，要去广州一段时间，然后便毅然不辞而别，离开年迈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

不料，此一去就是十多年，母子竟成永别！

思，两行清泪缘思亲

戎马生涯中，蒲公才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家乡和家乡的亲人。

1948年参加淮海战役时，身为华东军区两广纵队第一团副团长的蒲公才右肩中弹负伤。伤痛中的他思乡之情更浓了。

在蒲公才故居，挂着一张“蒲公才戎马一生



儋州市峨蔓镇下浦村的蒲公才雕像。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路线图”，红色的箭头标出了蒲公才参加过的大小战役：莱芜战役、泰安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枣庄战役、淮海战役、渡海战役。

1949年3月，蒲公才随所在的部队两广纵队南下参加解放两广的战役。9年来，蒲公才转战淮南，驰骋华东，现在要进军广粤，打回老家去了。远方的老母还好吗？是不是正倚在门旁盼儿归呢？蒲公才此刻心情起伏，思绪难平，真是：一片丹心为报国，两行清泪缘思亲！

1950年初的一天，蒲公才在118师驻地海边，突然见到从琼崖纵队派来的干部蒲藁。蒲藁告诉他，因多年来音信全无，家乡人都认为“广言二叔已经革命成功（意即牺牲）了”。蒲开恒告诉记者，那时，蒲公才的家已经发生了大变故，但由于当时正处渡海作战的紧张阶段，蒲藁不敢把具体情况告诉公才。

老母亲可好？兄弟可好？妻儿可好？一心扑在战事上的蒲公才总会抽空望一望海峡那边。有一些事他很想知道，但又怕知道。真是近乡情更怯啊！

见，父子相见不相识

蒲公才随主力部队在临高角登陆。在抢滩战斗中，敌人岸防火力凶猛。公才奋力冲上岸后，才发现跟随他身边的6名战士只余下两人。蒲开恒说，蒲公才命大，要是他的亲人也这么幸运就好了。

蒲公才的外甥、86岁高龄的许仁书还记得当年的好趣事。

进入海口后，蒲公才留在司令部作战处，忙于接管工作。一天，一位中年人带着一位十多岁男孩来访。蒲公才竟一时认不出他们是谁。中年人对孩子说：“开志，唤爸爸！”这是志儿？蒲公才一把将孩子揽过来，泪流满面。再仔细一看，这中年人不正是小时的玩伴、堂侄蒲开国吗？

原来，因蒲公才兄弟参加革命，1947年，国民党军队袭击下浦革命老区，放火焚烧了他们家，家财也被洗劫一空。更残酷的是，叔母被砍数刀惨死村头。

母亲早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兄弟广爱和广功为革命于1948年先后牺牲，公才的大儿开平因无钱治病而夭折。两个儿子开志、开文和几个侄子失

去依靠，就靠创地里剩下的地瓜和外出讨饭度日。

蒲公才跌坐椅上，久久无语。公才啊公才，对上，你没能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对中，你欠兄长长期供读之情；对下，未尽长者养育之责。愧、疚、痛、恨，五味杂陈。多少个夜晚，蒲公才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母亲那瘦弱的身影，听到母亲临终时的呼唤：“广言我儿！广言我儿！”

蒲公才右肩的弹片一直未取出，伴随了他一生。每逢阴雨天气，他的肩、背便隐隐作痛。而他心头的思乡之情、对亲人的愧疚之情不正像这伤痛一样，时时发作吗？

下浦村的小集市上，还保留着蒲家当年用于收购、批发海鱼的一个商铺。走进这空空的屋子，仍能闻到一股浓烈的鱼腥味，仍能看到墙上挂着蒲母的画面。走出商铺后门，就是宽广的大海，海浪直冲脚下。物是人非古今事，星移浪涌慨以概。

蒲公才，这位儋州、海南人民杰出的儿子，是母亲给了他慈爱而坚强的心、刚直的性格，大海给了他博大宽阔的胸怀，奋斗不止的精神。

成大事者留下了大遗憾，付出了大代价。蒲公才付出了，但也收获了，他收获的是人民解放的大事业！这应该可以告慰亲人在天的亡灵了。

（本报那大6月29日电）

一起残酷的屠村事件

1947年，儋县峨蔓地区5个村庄100多人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余者逃亡全岛各地

本报记者 李科洲 李关平 通讯员 谢振安

母亲被杀死，不到1岁的儿子还趴在她身上吃奶。64年过去，这样惨烈的事说起来仍然叫人唏嘘不已。

在儋州市峨蔓镇林屋村，随便问村里一个稍上年纪的人，他都会告诉你，1947年，这里发生过一起残酷的屠村事件，史料称之为“峨蔓大惨案”。

走近村里的林屋祠堂，只见屋前古木森森，屋后巨石成堆，人称林屋山。

祠堂前的门槛石有一道醒目的裂痕，55岁的村民林道周告诉记者，这是当年屠村的人用锤子砸出来的，是峨蔓大惨案的见证。

那时，林屋村很让国民党政府忌恨。

这得从林屋祠堂说起。1933年，在蒲公才的哥哥蒲广爱的帮助下，中共琼崖西南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峨蔓落脚，几年间，迅速发展了包括蒲公才在内的批党员。1935年和1938年，西南临委在林屋祠堂分别举办了两期培训班，为党培养了干部，也宣传了革命，附近村庄很多青年因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林道周告诉我们，当年，5个村庄有2000多人，绝大部分村民都是支持共产党的，他们送钱物，送儿送女参加革命。这样的“赤化”是国民党难以容忍的。

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峨蔓地区进行了空前的洗劫。上浦、下浦、新村、林屋、沙井等5个村庄被烧光、铲平，100多人被杀害。

下浦村40岁的蒲休亮告诉记者，那一年，他奶奶抱着他出生不久的父亲，正准备逃上林屋山时被捉，并被杀死在林屋祠堂的一棵树旁。蒲休亮的父亲当时不到1岁，可怜的孩子，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变故，还趴在母亲身上一个劲地吃奶。

行凶者正要对婴儿下手时，队伍中一位姓陈的中年人正好膝下无子，便要求抱养。一个月后，蒲休亮的姑婆打听到姓陈的是邻村人，便凑足钱款，按蒲休亮的说法是“一担白银”，换回了他爸。

就在那一次惨案中，蒲公才的叔母也被砍数刀死于村头。还有10多人在深夜乘船突围，被国民党派船追上，除1人跳海逃脱外，余者皆被射杀。上浦村党支部书记蒲国材和林屋村党支部书记林振亚，这两位由蒲公才发展的党员也在其中。此时，蒲公才正在华东前线浴血奋战。

惨案发生后，5个村庄的村民全部出逃，流浪到三亚、八所、乐东、港门等地谋生。解放后，这5个村庄被列为“红色村庄”，外出干部于是成立“复村委员会”，收回被占用的田地，搭建茅草房，村民陆续回流。1954年，当地政府发放救济金，村民们才住上了瓦房。

（本报那大6月29日电）

蒲公才生平

蒲公才，原名广言，曾用名鸿英，1908年11月出生於儋州市峨蔓镇下浦村。

1930年入读北平中国大学附属高中部，1932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返乡。

1934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中共儋县县委峨蔓总支部书记、儋县县委江北区委书记、儋县县委委员和琼崖西南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儋县和西南各县的革命斗争工作。

1938年9月，受琼崖特委选派到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1940年2月毕业。其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二师作战参谋、作战科长、人事科长等职，参加反“扫荡”、反“清剿”、开辟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东野战军二纵作战科科长、两广纵队副团长、团长等职，先后转战苏皖鲁豫粤等地，参与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等大战役。1949年10月率部进入广东省解放粤东。1949年12月调入40军，参加渡海战役解放海南岛。

1950年任海南军区副参谋长。

1952年春，奉命赴朝鲜战场参战，同年9月回国，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1954年11月结业后分配到军委训练总监部，先后担任军事科学条令部总支委员、党委委员、战史处处长、战争经验处处长等职。

1957年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59年—1963年，先后担任工程兵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工程兵科学研究部军事科学研究所所长、工程兵科学研究设计院技术装备研究所所长。

“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1978年获平反。1978年12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工程兵工程学院顾问。

1982年6月27日，病逝于南京，享年74岁。

（李辑）

满怀激情寻访红色遗迹

本报记者 魏如松

“在红色的海南岛上——琼崖革命遗址寻访”，是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为纪念建党90周年所精心策划的一个大型报道活动。得知自己能够成为报道组成员，心中充满兴奋与期待。

采访前，编辑部门邀请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专家给报道组成员授课，并要求参与报道的采编人员要认真组织学习、消化史料，用鲜活的笔法再现光辉历史，歌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第一卷》、《海口革命斗争史》、《琼海革命斗争史》……成为我每天反复翻阅的“红色宝典”。

寻访报道第一篇，从采访琼崖仲恺农工学校开始。为什么这样一所传播革命火种的学校会落户嘉积，成为记者关注的问题。

94岁的洪剑英，向记者还原了哥哥洪剑雄生动的形象。洪剑雄是黄埔军校一期学

员，他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洪剑雄和妻子张婉华是在邓颖超关心下结为夫妻的，而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举行婚礼时，邀请很少朋友参加，其中就有洪剑雄和他的妻子张婉华。报道见报后，我接到热心读者的电话，表示以洪剑雄的革命事迹中很受教育，驻守在澄迈的武警某部官兵还打来电话，询问洪剑英老人的住处，要在“七一”前慰问老人。

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靠的是什么呢？是崇高的革命精神。这也是留给当代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亲身去体验，就无法真正理解信念的力量有多大。

随着报道的陆续推出，也在读者中掀起了学习党史的热潮。这也让我深深感到，做新闻报道，只有积极创新，革命题材同样可以让读者想看、爱看。

80后唱响红色旋律

本报记者 丁静

子弹穿过了他们的胸膛，但革命者的眼睛依然如炬，穿透时代，照耀后来人。

采访中，我发现烈士战斗过的土地依然保持着一份温热，那里的人们在享受和谐富足生活的同时，没有忘记曾经的艰苦岁月。在23年红旗不倒的六连岭根据地，如今万宁市和乐镇六连村人均收入7500元，是万宁的“首富村”，77岁的周先民曾经为革命队伍送信4年，他说：“与革命同志在一起，就像见到了家人一样亲切。”

一位烈士，一处革命遗址，就是一座人生的丰碑。先烈们走过的道路，是一条奋斗之路，是一条不断探索、追求真理之路，是一条辉煌的人生之路。今天，当我们踏上“红色里程”之时，烈士的从容与力量指引我们前行。

我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有幸以记者的视角，寻找在琼崖大地上发生的动人故事，身临其境地感受那份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情怀。寻访琼崖革命遗址的经历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探寻历史、重温历史的旅程，也是一次净化心灵、叩问灵魂的旅程。

信念最可贵

本报记者 李科洲

但他们每人身上都带着一件最珍贵的“宝物”：信念！他们相信黑暗一定会过去，相信穷人一定会翻身，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水肿病、痢疾、疟疾、夜盲症，不能让他们倒下；敌人围、猎狗追，无法让他们屈服。他们以野菜为食，以树叶当衣，以大地作床，坚强地度过了8个多月，度过了漫长的200多个日夜。

信念是他们心中的明灯，照亮了漫漫长夜中前行的路。他们保存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并让它在琼崖大地熊熊燃烧。

当前，国家出现了一些贪腐分子，他们就是一些失去坚定信念的人。或者说，他们也有“信念”，不过，这一“信念”是金钱，是官位。他们就像看不到灯塔的船，无法把握正确的航向。

信念是必不可少的，是最为宝贵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

本报记者 陈 耿

琼崖革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牢固根基，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君不见，有多少劳苦大众，为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出粮的出粮，出钱的出钱！

君不见，有多少热血农民在思想觉醒后，走上革命道路，不惜抛头颅和洒热血！

君不见，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海南的革命者历尽了艰苦卓绝，一次次地遭到敌人的“围剿”和叛徒的出卖，但在老百姓的

掩护和帮助下，总是一次次地化险为夷！

君不见，有多少堡垒村庄和堡垒户，为了支持革命而遭受敌人残酷的屠村和杀害！

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琼崖共产党无疑是“得道”者，他们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不与民争利，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所以才能得民心，并最终迎来海南的解放。

先烈们离去多年。历史早已作结。可是，他们的英勇精神永不过时，感染和激发像鹿启江一样的人们，在如今幸福的生活 中传承、发扬。

为先烈落泪奔走

本报记者 胡续发

军知情人时，一条凶猛的大狗扑过来，一口咬向他，痛得他直打寒颤。被狗咬，他经历过6次，小腿、臀部都留下了狗的牙印。

“若是挺苦的，但我想想，当年的娘子军女战士以柔弱身躯，在枪林弹雨中奋力冲杀，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为她们做点事，遇到点挫折，算得了什么！”鹿启江这样对我说。

辛勤总算得到回报。他撰写的《红色娘子军传》即将出版，420页、34万多字凝

故事，宣传她们的伟大精神。

有一次，他骑摩托车去探访万宁山区一户农家，打算拍摄还在世的红色娘子军老战士的生活照。途中，下起瓢泼大雨。这时，摩托车偏偏坏在路上，他只好下车推着走。周围一片荒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想找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平时就有气管炎，这时又发了。胸口憋闷，难受得大口喘气，上下坡十分吃力。

而此前不久，鹿启江进村走访红色娘子

寻访革命遗址，我总是被那些英勇献身的革命者所感动。他们或生于富裕，或出身贫穷，但无一例外是人中豪杰。我常常想，为什么他们会提着头颅参加革命？为什么他们能扛住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在寻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遗址时，之前有些模糊的答案渐渐露出了清晰的眼目。

对于我，那是一次震撼心灵之旅，是一次洗涤心灵之旅，是一次人生思考之旅。

1932年8月至1933年4月，琼崖革命领导者冯白驹带领20多人的红军队伍，坚守母瑞山，经历了琼崖革命史上最艰难的岁月。他们几乎什么都缺，缺少吃的，缺少穿的，没有住的，生命更没有保障。

军队人数不如国民党，武器装备不如敌人，琼崖革命的红旗为什么还能坚立23年之久而不倒？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寻访先烈故居和后人，以及那些战斗遗址之后，记者觉得这话应该最能说明共产党在海南岛取得革命最终胜利的原因所在。

在中共琼崖一大召开之前，海南的共产党人就深入农村，扎根底层，接触农民，关心他们艰难的生存现状，了解老百姓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琼崖共产党人在农村创立农民协会，办起平民学校，在教农民识字的同时，灌输民主思想，激励革命热情。

以冯白驹为例，在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他的足迹就遍及府城、海口

一个60岁的坚强男子，向记者介绍红色娘子军史时，竟然多次忍不住啜嚅大哭。软款之情，溢于言表，令人动容。

我踏访革命遗址，遇到了一些这样的人。其中的感人故事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无尽感慨，于我而言是一次生动而深刻的教育。

这位男子叫鹿启江，琼海市阳江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我对红色娘子军精神十分敬重！”这是他发自内心最深处的声音。

一辆破旧的摩托车、一台老式的相机、一顶陈旧的草帽。几十年来，人们见到的鹿启江就是这样，常常奔波在琼海各镇、万宁、琼中、定安、陵水等地，走遍100名娘子军战士的故乡，寻觅、探访健在的娘子军老战士及其亲友，收集她们的英雄